

【人物研究】

试析陈云关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

张雪英 张 侃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建国初期，他主要是探索国际物资市场的规律，并逐步形成了“外汇与物资平衡”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并将注意力从国际物资市场转向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后，他在继续提倡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强调利用外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将引进工作与国内工作平衡好。陈云的这些关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成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键词】陈云 国际市场 思想

【中图分类号】D2-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5-0073-06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有诸多创新性的阐述，是中国处理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陈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际市场”的理论阐述与具体实践，都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强调不同的重点。总结陈云的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有助于增强忧患意识，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时，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对策和措施考虑得更加周全，以增强在改革开放中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建国初期，逐步形成以“外汇与物资平衡”为核心的对外综合平衡理论

建国前后，陈云认识到，由于外资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没有发行新币的情况下，利用外商银行维持金融稳定是一种重要手段。1948年10月，陈云代表东北局接收沈阳，在沈阳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不是要把他们一脚踢开，对他们要采取慎重而适当的政策”^[1]。11月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汇丰银行处理事宜，提出维持其营业，等摸清情况后再决定有关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中央肯定。^{[1](p.534)}

陈云认为，保留外资银行在华的经济活动，并不代表允许其自由放任。1949年5月陈云进京后，立即约见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商谈利用外汇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p.563)}6月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以稳定上海局面；6月18日，陈云即以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名义起草致各大区电，就统一外贸税则和外汇管理等问题征询意见。^{[1](p.568)}经过研究调查，9月20日，陈云同薄一波向中央提交关于外汇工作的书面报告，提出限制与

【收稿日期】2008-05-29

【作者简介】张雪英，副教授，福建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364000；张侃，副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361005。

利用外商银行的措施，主要内容有：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工作的管理和经营，指定8家私人银行、4家外商银行作为中国银行外汇交易所的交易员；对牌价和国营单位的外汇交易进行管理，减少由于国际货币波动造成的损失。^{[1](pp.578-579)}为了保证中国外汇主权不受损害，12月，陈云还联合薄一波、马寅初致函海关总署，要求其以债权人名义直接函告各存款银行，声明旧海关在国外存款的所有权。^[2]1950年7月5日，陈云又同薄一波就国民党政府所欠苏联债务事项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批评了华东贸易部没有经中共中央同意，将原来国民政府欲交未交的偿还苏联债款的部分货物交给苏联，认为此事涉及中国对国民政府所欠外债的整个政策，应统一处理。^{[2](p.61)}这些举措力图集中对外信用于国家银行，构成外汇平衡的一道屏障，以利于统一货币制度的出台。

陈云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但又必须利用现有国际市场。1949年1月1日，陈云通过中共中央致电香港钱之光，了解香港市场黄金、银元及物资情况，以掌握进出口的趋势。^{[1](p.544)}7月19日，他又向中央汇报英国怡和洋行试图与中方商谈的情况，并建议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开展外贸活动，尽快进入国际市场。^{[1](p.570)}10月4日，陈云主持中财委所属各部委联合办公会议，研究向建交国派遣商务参赞。^{[2](p.1)}10月21日，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他认为维持几个大城市的供求平衡，避免物价波动，必须拟定主要外销产品的收购计划、收购价格和经营方式，拟订必需的进口货物计划并准备充分的外汇。^{[2](p.3)}1950年，陈云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国家统一猪鬃等出口，利用中国特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达到换汇的目的。^{[2](p.23)}此后他和薄一波向中央提交对外贸易初步计划，认为1950年国家可掌握4.7亿美元，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权。^{[2](p.25)}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但陈云认为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完全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早在1949年上海财经会议上，他就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可以利用”。^{[1](p.572)}

陈云认为，利用国际市场，就必须掌握好有利时机，既切实购买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又切实保证外汇资金的安全。1950年7月，为防止美国冻结外汇与美元贬值的损失，陈云提出了用得方的方针迅速使用外汇的主张。^{[2](p.62)}12月，陈云领导中财委拟定“应对美国对我经济封锁的七项对策”，指出，向欧洲国家及英镑区的订货应尽快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在中立国的存款应即购货运回。^{[2](p.75)}1951年1月，陈云还提出，在对美出口被冻结，对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未澄清，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订货未运回国以前，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政策必须适合于进口情况。^{[2](p.78)}5月28日，针对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案，中财委发出明确指示，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将外贸工作重点转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2](pp.100-101)}1952年6月，国际经济关系有所松动，陈云又签署中财委《关于处理被冻结美汇的决定》，指出，1950年12月以来被美方冻结的美汇虽暂时不能使用，但不能认为已经损失而不注意解冻复活的工作，各种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复活，以减少损失。^{[2](p.140)}

1952年，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主持筹备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周恩来多次批示要求采取灵活的多面政策^[3]，“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4]，对此陈云十分赞同。1952年5月，他提出“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2](p.138)}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莫斯科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11

个国家签订了价值 2.23 亿美元的进出口协议；南汉宸说服 3 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签订了价值 1.68 亿美元的贸易合同。^[5]

陈云非常强调对外经济中的自主权。他认为，利用国际市场并不意味着受制于国际市场，外贸活动的根本还在于内部市场的综合平衡和利益保护。这一认识对正确指导中锡贸易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据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与锡兰签订的协议，中国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的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 5%~8% 购进。^{[2](p.150)} 为了多购买锡兰橡胶，外贸部提出将向锡兰出口的大米由 20 万吨增至 30 万吨，并将每吨米价降低 1 英镑。周恩来就此向陈云征询意见时，陈云认为，增加对锡兰出口大米是为了用进口所得款项向锡兰商人购买橡胶。由于我方卖米所得的是锡兰卢比，而锡兰政府并不负责橡胶价格，这样出口越多，越促使其橡胶涨价，使我方受损。故我方与其增加对锡兰的大米出口，不如改向印尼出口大米换取橡胶。^{[2](p.153)} 这个事件充分体现了陈云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对外综合平衡思想。

陈云按照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以粮食的国际贸易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了推进工业化，我国不仅从农业提取剩余获得原始资本，而且组织粮食出口，用以换汇和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但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口粮危机，陈云建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指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就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各种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6](p.80)} 周恩来采纳了陈云的意见，甚至还计划与美国做生意，谈判进口粮食的合同问题。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动用外汇增加粮食进口，自此，外汇就被大量用于进口粮食，为 60 年代开始的经济调整提供了条件。

关于粮食进口，陈云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粮食虽然能从国际市场进口，但是作为战略性物资，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存在风险，一定要保证自给。他由此开始注意粮食增产与化肥生产的关系，力图在利用外汇进口粮食之余，进口制造氮肥设备建设化肥厂。在陈云的细致安排下，通过引进设备建设了一批化肥企业，使中国的化肥工业走向快速发展道路。

从 1962 年开始，陈云没有直接参与更多的经济领导工作，但他所奠定的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工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被其他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并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大胆提出“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势头趋好。1972 年 4 月，陈云返回北京后，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大胆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6](p.219)}，“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6](p.218)}。

不过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陈云这时的关注点，从国际物资市场为主转向国际金融市场为主，开始思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次经济危机，国际上有大量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金，愿意向我投资，形势有利。1973 年 6 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向陈云汇报,认为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信贷资金。陈云就此指出,“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6](p.219)}在陈云的支持之下,1973年,中国银行筹措了10亿多美元的外汇资金,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宝贵的经验。

卷入国际资本市场,就要面对国际金融风云。因此,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对外汇储备进行保值增值,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国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拿出外汇买黄金保值。1973年7月,他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要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当国际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中国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说:“买黄金是为了保值,不是投机。买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卖出去?在需要付款的时候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7]。李先念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买入黄金。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很重要的资金支持。

在陈云看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多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特别在期货交易上,陈云有着独到见解。1973年4月,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通过黄金买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很快赚回了30亿美元,在当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对外经济的本质性突破。

这一时期,陈云还格外重视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他从区别固定价格与变动价格入手,深刻揭示出国际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建国初期,对苏联国家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基本上是固定价格”,“现在情况变了,对资本主义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价格是变动的”^{[7](p.1408)}。他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7](p.1412)}

陈云还明确指出:“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6](p.228)}“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6](p.224)}。按照这个思路,1973年10月3日,陈云在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了解了棉花加工和小五金加工的情况后,主张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加工出口。这个做法,从实质上讲,就是后来说的来料加工。这种做法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国际市场竞争是价格竞争,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最有利的竞争力是低廉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确立市场竞争力之后,就可以扩大市场获取外汇,进而购置更为先进的设备进行产业升级。正如陈云所说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7](p.1422)}。

推动国际市场开拓与指出国际市场风险是陈云一以贯之的辩证观点。比如陈云认为,港澳的出口贸易既有利又不利,有利是我们可以占领食品和传统出口品市场,不利条件是香港、澳门是自由港,竞争激烈,国外资本家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杀价倾销,企图挤垮国货,“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6](p.228)}为此,他更进一步指出要利用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市场调整,拓展国际市场,既要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市场

这些老的市场，又要“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7](p.1425)}这样的新的市场。他还指出，“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市场，要分散。过于集中会被人垄断，受到控制时，我就被动。开辟新市场，在开始时，在价格上，出口可以稍低，进口也可以稍高，这样有利于建立新的据点”^{[7](p.1413)}。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陈云关于“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73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8倍。^[8]外贸出口创汇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条件。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强调利用国际市场要有清醒的头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当时的领导人提出，“原来我们提了一个六十五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一百八十亿美元”^{[7](p.1471)}，该计划后来膨胀为850亿美元^{[7](p.1472)}，导致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国外资金过热。此时的陈云除了继续倡导对外开放，还反复强调利用外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6](p.252)}

陈云在认可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同时，更强调综合平衡，即将引进工作与国内工作平衡好。1979年3月21日，针对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考虑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孤立地只看到国际上有大量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而是要把国外和国内、局部和全局、目前和长远结合起来，权衡利弊，统筹考虑。^[9]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6](pp.248~249)}。

深入研究国际资本后，陈云将外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买机器设备的买方贷款，这种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一种是高息自由外汇贷款，属于周转外汇的性质，只能速借速还；一种是带有援助性质的低息自由外汇贷款，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要十分谨慎使用。^{[6](pp.264~265,276~282)}在此基础上，陈云认为，要正确地利用好国际市场，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清楚认识国情，对能借到多少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多方面考虑贷款形式和数量，以便统筹安排使用。他强调说，“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6](p.280)}。第二，着眼点是要提高生产力，明确重点，精心部署和精密计算。“外资的利用，怎样利用法，利用多少？我们脑子里头要有个框框。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利，可以很快滚动，就先利用起来。哪些东西必须利用，就是利息高一点，如果我们转动得快，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要搞”^{[7](p.1618)}，外资“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6](p.277)}

陈云还强调指出，借用外资要保持清醒，不仅在经济上要清醒，而且在政治上更要清醒。1980年12月，他告诫全党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

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6](p.277)}“有些人看到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6](p.332)}“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6](p.277)}陈云的这些讲话,旨在提醒全党警觉在对外开放中引发出的一些消极问题,为正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陈云利用“国际市场”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启示

陈云是党内比较早地对“国际市场”提出一系列战略设想并付诸实践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直重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辩证分析了国际市场在补充物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调整产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他强调国际市场是综合平衡的有机组成,即外汇与财政、信贷、物资之间的平衡,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平衡,都反映着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要求。而且更为深刻的是,他认为利用国际市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有利条件,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项目、技术设备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原则,充分利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时,国际收支平衡成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在国际汇率日益市场化的状况下,如何有效运用?亟须出台新措施。与此同时,短期热钱频繁进出股市、房市等领域,成为经济急剧波动的直接因素。显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曾说,陈云的一系列建议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0]。陈云的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其核心内容是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改变为有计划的市场,在宏观调控下,使国际市场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这个思想经历了实践的检验,极具前瞻性。

[参引文献]

- [1]《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页。
- [2]《陈云年谱(1905~1995)》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 [3]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页。
- [5]邓加荣、韩小薰:《南汉宸传》,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157页。
- [7]《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4页。
- [8]《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三。
- [9]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责任编辑:李强]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During the**Planned Economy Period** Cheng Haijun (48)

Abstract: Set up in the 1950s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was gradually consolidat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nd was a welfare model with a strong color of planned economy.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China developed a rather complete social welfare system, 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uaranteeing the people's life and had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this period was stamped with the marked brand of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had great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 earnest research on it will b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future social welfare system.

Keywords: social welfare, planned economy, civil welfare, historical judgment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Private Book Businesses

..... Pan Wennian (56)

Abstract: The private book busines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gradually been growing: from serving as a supplementary to the state-owned book businesses at the start, to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 when the private book businesses served as "the second channel" and sought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vigorous development that makes them share the Chinese book market with the state-owned book businesses on a fifty-fifty basis. Their position in the whol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continuously been strengthen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roles of private book business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periods in our country and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 will help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China's cultur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words: private book businesses, historical position, role

*** Personage Studies *****Measures Taken by Chen Yun in Solving the Cotton Crisis as a Result of****"Embargo" in 1951** Chen Donglin (65)

Abstract: The measures Chen Yun took in solving the cotton crisis as a result of the "embargo" in 1951 were as follows: First, reducing consumption. For a given period most textile factor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uspende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have more cotton for military purposes. Second,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The cotton yarn and cloth market was put under state control through the measure of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the cooperatives took the lead in purchasing cotton in advance and in toto. Thir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raising the buying price of cotton and marketing price of cotton cloth and cotton yarn, collecting the taxes in arrears for cotton and cloth stockpiled by intermediate merchants, adopting a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cotton sellers and inspiring the cotton farmers' enthusiasm to sell their cotton. Fourth, promoting the buying of cotton. The whole Party and whol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set off a cotton-purchasing mass ferv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en Yun's thinking of combining market with planning and combin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with price regulation China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cotton crisis arising from the "embargo", which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recovery.

Keywords: Chen Yun, cotton, 1951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Chen Yun's Thinking on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Market** Zhang Xueying & Zhang Kan (73)

Abstract: Chen Yun made positive explorations of how to utiliz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Republic, he probed mainly into the law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market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idea of “balance between foreign exchange and materials”. In the 1970s he proposed to “study and make use of capitalism” and shifted his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market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 With the launch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le continuing to advocate utilizing the capitalist market he stressed to keep a sober mind in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and do a good job of balancing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domestic work. All these ideas put forward by Chen Yun on the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became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foreign economy in various periods.

Keywords: Chen Yun,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nking

*** Local History Research ***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Guilin

City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Li Zheng (79)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Guilin City had a weak base of modern industry but had a solid base of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aimed at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general and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particula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and support of the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owners of privat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sinesses for a healthy growth. With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three years, Guilin was changed from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ity under the control of old bureaucrats into a new democratic city of production.

Keywords: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Guilin City,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Hebei Province Going in for Rural Dining

Halls in a Big Way Li Chunfeng (88)

Abstract: In the period from the first half of 1958 to June 1961, the rural dining halls in Hebei Province underwent a tortuous course of hopping on the bandwagon, having to close down, being forced to carry on and coming to a permanent end. The fate of rural dining hall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at of the movements of “Great Leap Forward” and people’s commune. When the movements of “Great Leap Forward” and people’s commune roared on, swift and violent, the rural dining halls sprang up like mushrooms in Hebei Province; similarly, when the movement of “Great Leap Forward” came to an end, they also ended in failure.

Keywords: Hebei Province, rural dining halls, the movement of “Great Leap Forward”, the movement of people’s commune

Analyses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Shanxi Provi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Jingping (95)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Shanxi province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developed in an unbalanced way, the re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progressed very slowly, the dominant industries have always been heavy and black ones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has long operated at a low level. The root causes for this backwardness are: one, the limita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vince’s industrial positioning of energy base for the state; tw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on this province, under 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of economy is underdeveloped, the investment is too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coal